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五辑
(1945—1950)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0.25印张 2插页 1150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

ISBN 7-201-02961-4/K·387

定 价:8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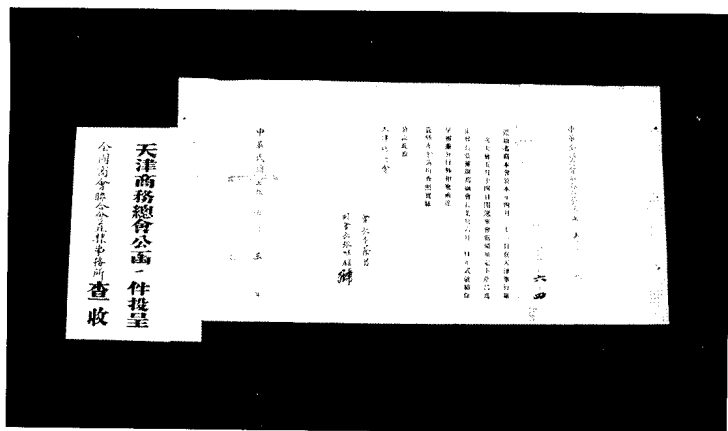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45~1950)

编辑组成员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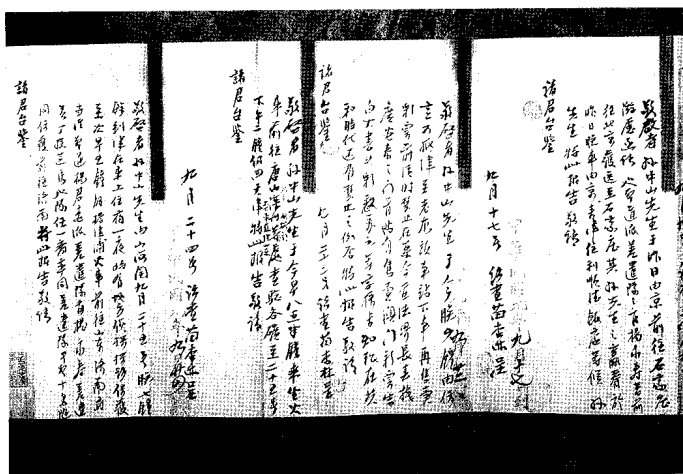
主 编:	胡光明	蓝长澍
成 员:	林纯业	宋美云
	谢钟祯	任云兰
	王绍惠	刘 琳
	杨蕴珠	



天津商会会所大门旧影



天津商会会长卞荫昌就任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大会（天津）会长函 民国元年（1912年6月3日）（津商会二类196号卷）



天津商会关于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黄兴北上行踪的报告
 民国元年（1912年9月17日、22日、24日）（津商会三类
 2789号卷）



1981年5月~1996年6月期间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编辑组成员

前排左起：王绍惠 杨蕴珠 刘琳 宋美云 卢鹤松 任云兰
 邢毓芬

后排左起：蓝长灏 林纯业 谢钟祯 胡光明 张鸿藻 毕杰
 （李健同志因事缺席）

序

聂璧初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45—1950）即《汇编》（1903—1950）全套书的最后一辑，经过胡光明、蓝长灏和编辑组全体同志共同努力，终于继《汇编》第一、二、三、四辑之后，公开问世了。这不仅是我市社会科学战线，且是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实在可喜可贺。

本辑的原始记载显示，1945年，日本投降及国民党势力重返平津和华北后，天津及各市商会很快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组。但这时，由于天津工业界以李烛尘、侯德榜、宋紫卿、朱继圣、周叔弢、孙冰如、卢统之、陈调甫、顾味儒、王汰甄、王晋生、李惠南等为代表的工业企业家队伍已经崛起，他们大都是留学美国、日本和国内新式知名大学培育出来的科技专家和专利持有者。在当时国内的化工、纺织、面粉、机械、水泥等产业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满怀“实业救国”的热望和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的独立于商会之外的工业企业家团体——华北平津工业协会和天津工业会，为了我国的工业化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与振兴，尽可能广泛地占领国内外市场而奔走呼号，并对国内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和动员舆论。这一阶段的商会组织，无论是经济实力、队伍素质和社会地位，均远逊于工业会。所以，商会组织往往是追随工业会之后，从事一些较重要的活动。

本辑丰富的原始记载还表明，在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

平津华北工商文教和社会各界怀着“和平建国”的热忱，投入到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恢复中，国民党政权中少数有识之士，也力图做一些有益于民之事。所以平津等特大城市仍在迅速聚集和发展，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各级政府机构，却把从人民手中掠夺财物作为一切施政的根本目的，从而导致从中央到最基层整个国家政治的急剧腐败和一系列倒行逆施政令的快速出台，这就把他们自己扮演的“抗战胜利缔造者”的形象击得粉碎，把社会中一个阶层又一个阶层的人民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冲击下迅速土崩瓦解，给我们留下不少历史启示。

“天津商会档案全宗”（1903—1950）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从积极方面来看，商会曾在市场调控、行业管理以及经济组织、文化教育、城市管理乃至社会政治生活诸领域，发挥过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为我们今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具有借鉴价值的参考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市档案馆编研处组成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课题组，用整整16年的时间，编辑成册，将其精华公之于世，其间克服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编者们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奉献精神，也是弥足珍贵的。

《汇编》已经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我们天津对于这项工作的研究，应当说刚刚开始。听说天津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准备把历史研究和现实的调查研究很好结合起来，这是很可取的，我和我的同事都会支持这件事。

我深切感到，这个项目所以能圆满完成，是同有关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市工商联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历届领导的直接支持分不开的，这也是我市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同档案部门及实际部门、出版部门长期真诚合作的产物，也应大力提倡。

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五辑、10册近1000万字全部出齐的时候，特写出如上的话，是为序。

前 言

本辑内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至国民党政权覆亡这一近代中国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空前激烈、深刻变动的时期,即1945年8月15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和1950年人民民主政权对旧的社会经济团体实施改造初期的《天津商会档案全宗》1030个案卷的选粹,选录文献共900余件、经校点、注释、零散数据资料的汇总、归纳和统计,分类后予以出版,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

- 一、商会组织状况
- 二、工业协会与工业会
- 三、对日索赔
- 四、敌伪产业处理
- 五、参与金融管制
- 六、参与实施粮食管制
- 七、参加商务整顿
- 八、缓解实业危机
- 九、吁请减免捐税
- 十、参与筹划危急对策
- 十一、参与政治统治
- 十二、旧商会和工业会的结束与工商联成立

如所周知,由于在这一时期中,以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为标志,表明这一时期恰是我国数千年积淀的奴隶制、封建制,尤其是近代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向公正、公平、民主——社会大多数人当家做主的新制度嬗变演进的质的飞跃时期,同时是新旧势力有关中国两种

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关头，新旧力量的存亡兴废，直接关系到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乃至各个家庭、企业及其代表人物的命运。因此，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中介实体和工商界枢纽——商会、同业公会和工业协会、工业会，历经着纷繁复杂而尖锐的利益冲突，商品供求的巨大的反差，资金、物流、客流的反常规走势，国家政权和军队职能的变更及其与全社会的对立等等状态，其中所形成的历史档案，就显示了如下特点：

一、国民党政权覆亡前在军政经济方面的倒行逆施、挣扎与顽抗

在本辑 900 余件历史文献中，特别刊布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行政院、国防与经济委员会、社会部、财政部、经济部、北平行辕、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社会局等制定、发布、由商会和工业会组织实施的涉及这一时期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法规和政令，多达 232 个。其中仅金融管制的就有 61 个，粮食管制的 17 个；对日索赔和敌伪产业处理的 23 个，力图挽救实业危机的 33 个，进入 1948 年后危急时期的紧急对策 30 余个。而北平行辕特别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下达征粮催款、购筑城防的军令也有 18 项(次)之多。且急如星火、多如牛毛的捐税苛敛和摊派尚未包括在内。今天，我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冷静客观地分析判断这些法规和政令，除了诸如行政院发布的“敌性银行存款冻结债务不予清偿训令”、盐政部于发布的“长芦盐区专商引岸旧制一律废除训令”、经济部于 1947 年 3 月修正公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极少数法规政令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安定者外，95% 以上的法规政令都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聚敛社会财富并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目标的。特别是进入 1948 年，随着军事优势的逐步丧失，国民党政权的整个国家机器——从蒋介石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到最基层的分政权，都变本加厉疯狂地对整个社会进行疯狂的掠夺。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告诉我们，国家是统治阶级各个人实现

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它是以社会主人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①。这从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上观察可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国家政权无论由哪个阶级掌握,都还担负着一种组织社会生产、生活,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社会职能。而在实践中,“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收入最大化”^②。为了政权本身的根本利益,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和阶段,它并不顾及甚至严重伤害政权所依托的阶级基础。如1948年6月间立法院筹议举办临时财产税,名义上是打击独占垄断投机的豪门巨富,把这一税种的起征点定在仅相当于战前2~3万元资产的300亿元,实际是放纵豪门而苛征苟延残喘、奄奄一息的中产阶级。同年,又以掠夺民间金银硬通货为目标的金圆券发行,严厉取缔金银硬通货流通,等等,这就把社会中等以下阶层都推到了政权的对立面。所以,时人慨叹曰:“蒋政权不亡,天理难容!”

二、日伪商会的接收整理及力图有所作为

自1944年3月20日伪商会会长屈秀章逃走,天津商会会务一直由代会长邸玉堂主持,至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8月24日,津商会董监事联席会议仍督促屈秀章速返津主持会务,结果竟无音讯。据档案记载,邸玉堂在沦陷期间,百般媚日,千方百计为日寇搜刮铜铁、献机献金,其汉奸声名为全津商民所不容。同时,时任商会常务董事的刘静山,早年即拜在青帮头子白云生门下,利用青帮关系,结交官商各界人士,包办货栈业和干鲜果业牙税,为害乡里。1940~1944年间担任日伪商会会长后更为虎作伥,为商民所痛恨。因此,抗战胜利后,新天津市长张廷谔指令杨西园、王晋生、张伯麟、罗宗强、陈锡三、杨天受、秦幼林、朱继圣、宋秉卿、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1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同上书第21卷194~198页。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第45页。

莫川、何宗谦等 18 人为商会整理委员会委员，商会整委会于 10 月 27 日正式成立，29 日接收日伪旧商会，30 日公推杨西园为商会整委会主任委员，王晋生、张伯麟为副主任委员。杨西园回津前，职务由王晋生代理。是日通函中央有关部委和驻津各军政机关，开始正式办公。经过一年的整顿，1946 年 10 月 2 日选举出银行家姬莫川为理事长，王西铭、年光^五、王步洲、李聘之、陈锡三、蒋孟朴为常务理事，王子寿为常务监事的本时期第一届商会理事会。清除了犯有汉奸罪的邸玉堂、刘静山，净化了组织。同时，经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依据 1929 年公布的民国《商会法》拟定的《天津商会章程》，并略作了修改，如删去原第八项“遇有市面恐慌等事，有维持及请求地方政府维持之责任”，而增加了“关于工商业法规之研究及建议事项”。根据这个章程的要求，重新设立了商事公断处，处理各类商务案件。

当选为本届商会理监事和常务理事的共有 46 名，涉及 41 个同业公会，基本上是这些行业公会的理事长。而行业构成除了油盐柴米茶这些民生传统行业外，更有银行、机器漂染、毛纺织、图书、进出口贸易、面粉、新药、电料、摄影等和进出口贸易这些同世界市场对接后的新兴行业。46 名理监事绝大多数是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式商人，教育水准明显表现出对科技进步及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从上述天津商会章程的拟定、办事机构的完善与职责的明确、商会理监事受教育的情况看，商会在这一时期是很想有所作为、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但是当工业协会及工业会成立后，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设备、资金，才地资望兼备的实业家及其掌握的天津与华北一大批新兴现代民族工业公司，从商会脱离之后，商会的经费严重亏空，几无来源，会务难于开展。商会的地位与作用就大大降低了。

三、新式民族工业企业家群的崛起和工业协会、工业会的成立

本辑第二类标题为“工业协会与工业会”，这是已出版的前四辑中所没有的。这是天津乃至华北工业化水平与工业企业家群体构成特点的标志。

天津工业界团体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1911.5~1913年，天津工务分会。

爱国实业家宋则久为会长，李家顺等为董事、会址设于东马路。系遵部案设立，会长由部札委，并颁发图记。为振兴天津实业作了一些启蒙工作，于1913年部令以工商本一体为由撤销。

(二)1914~1928年，天津商务总会(1904~1919.5)和天津总商会(1919.5~1929)内的工场商。

宋则文、孙恩吉、李政庵等各业工厂主持人为董事。仅以商会内的一个行业的名义活动，宋则久等曾发起成立天津工商研究所，向当局提出过不少振兴工商的建议，举办多次“考工”和展览，至20世纪20年代。天津9大面粉厂及6大纱厂设立后，曾单独成立面粉业同业公会和纱厂商同业公会。

(三)1928.7~1937.7华北工业协会。

1928年7月3日，由华新、北洋等6大纱厂、永利碱厂、启新洋灰公司及大丰、寿丰面粉公司共同发起，其立会缘起明确提出经济乃政治之基础，“产业不发达，政治断难能望清明，互相因倚，有若机杼”，乃是数十年政局动荡之主因^①，并指出“自蒸汽机发明，世界生产事业遂生剧变”^②我国则因家庭式之经营，国民处专制淫威之下，造成“无团结力，无进取心”，而列强则“挟其汽动力，如倾山倒海冲锋而至”，以致“五千年来自给自足之生产组织，破坏殆尽”^③，造成我民族饥寒交迫的局面，所以必认定资本事业与技术劳力为同一目标，设立华北工业协会，以谋划广阔疆土新兴工业之

① ②③均见胡光明、蓝长湮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440~1441页。

发展。

华北工业协会的地域范围包括平津两市及冀、鲁、豫、晋、陕、甘、辽吉黑，热察绥等北方 15 省市。设总会于天津。各省区内有 10 家会员请求，可设分会。该会拟定章程 22 条，申明立会目的是：

甲、研究建设中国工业之方案；

乙协定促成工业之进步；

丙、受理会员委办事项；

丁、办理或向官厅建议关于会员公议一切事项^①

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久大精盐)为会长，余啸秋、林虎侯等 9 人为干事。平津冀和山东鲁丰纺织公司、辽宁纺织公司等骨干企业 30 余家为会员。主持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蒸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器大工业的近代企业家共 46 名，其中不少人为留学欧美日本的技术专家和优秀管理人才。初步显示了华北近代产业的产业构成和新型企业家群体阵容的齐整。

华北工业协会在 1937 年平津及华北沦陷后为避免被日寇利用而宣布解散。范旭东等迁往大西南，开始了又一艰苦的创业过程。

(四)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分会与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1943.4.~1948.3):

这一囊括各工业门类的纯工业团体，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成立于四川重庆。开创了我国新式近代工业独立于商会之外的纪元，是我国民族工业资本家阶级经济实力增长和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其成立宣言称：“我国非竟抗战全功无以保障领土主权之完整”，“非积极建国无以改变军事、政治、文化停滞落后状态。

^① 前引《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 1440 页。

所以,以倍加淬励,精益求精,以达我国早跻于工业化之境域”。^①会章规定工业协会十大任务是:一、促进全国工业化;二、促进产品标准化;三、促进工业金融发展;四、劳工福利之增进;五、事业保险及必要统制之推行;六、工矿业之调查统计及编纂等等^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迁沪办公,接着将总会会址设于南京,上海设办事处。1946年11月间全国工业协会代表大会上,天津工协代表侯德榜当选为全国工协常务理事,陈调甫为理事,王翰臣为常务监事。

全国工业协会下设10个分会,按照立会的时间先后大体为:天津、重庆、青岛、云南、江西、山西、上海、安徽、台湾、湖北。

全国工协天津分会发起于1945年10月间,最初由朱继圣等12人发起,后因工协总会指定爱国实业家李烛尘为天津分会筹备人,于该年11月重新开始筹备工作。依总会章程要旨拟定天津分会会章44条,于一九四六年四月经社会局批准正式成立。

工协天津区分会理事长为李烛尘(久大盐业),常务理事为宋棐卿(东亚毛呢)、劳笃文(唐山华新)、秦幼林(德盛窑业)、陈调甫(永明漆厂);理事为侯德榜(永利化学)、周叔弢(启新洋灰)、王晋生(华北制革)、王汰甄(中天电机)、朱梦苏(北洋纺织)、何宗谦(天津造胰)、嵇南笙(耀华玻璃)、孙冰如(寿丰面粉)、陈范有(开滦煤矿)、王瑞基(中纺天津分公司)等。朱继圣(仁立毛呢)、谭志清(光明丰记油厂)为常务监事,共由31人组成,其会员为56家,最多时为60家,较抗日战争前华北工业协会时代天津产业的产业规模更加壮大,结构也更健全,近代企业家的阵容则更加齐整。虽因国民党社会部之命工协天津分会一度更名为“天津市工业协会”。但很快又改称“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

① 前引《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45~1950)第1448页。

② 参见本书第1484页。

全国工业总会和天津工业会的组建,是由于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工业会法》。明定工业会以谋划工业之改良发展,增进同业之公共利益为宗旨,并宣布“工业会为法人”。改变了工业协会为自由人民团体的性质。全国工业总会以刘鸿生为会长,下设14个分会。按时间先后为:天津、河北、北平、青岛、汉口、重庆、上海、江西、江苏、甘肃、浙江。由于工业会均以省市命名,相当一批省份未及成立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工业会亦随之流产了。

依据《工业会法》,天津工业会于1948年3月30日开始筹备,5月16日正式成立,理事长仍为李烛尘、理事会其他成员也大体未予更动。入会团体会员为9个,出席代表45人,代表工厂1337家,工厂会员194家,出席代表374人。

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和全国工业总会及各省市分会这样重要的实业团体,尚无人作较认真的研究,本辑所刊布的珍贵文献,将成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基石。

四、商会、工业协会、工业会——国民党反动政权军政法令的忠实执行者,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曾作过坚决抵制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的天津已成长为位居上海之后的国内第二大商埠。抗战胜利后,平津两市依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而且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和华北首位进出口商品集散地、经济中心,其人口规模已超过北平,耗电量则相当于北平、唐山两市的总和。控制了天津就意味着掌握了北平和华北,因此,踞有平津成为美蒋华北战略的核心。而作为这样一个北方第一商埠的市场与社会的重要中介机构——商会、工业协会与工业会,在社会制度根本变动的关头,面对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凭藉手中掌握的军队、警察和监狱以及政权机器和传统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是解放区人民革命胜利的威势和真理的感召,蒋管区广大商民的哀怨、抵制和反抗最终体现于社会公共利益与极少数人及其集团特殊利益的冲突,尤其是基本生存权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商会、工业会为了自

身的物质利益与生存安危,配合与屈从于反动政权,自然成为主导的方面。主要情况是:

(一)日降后美蒋军队入津前的特殊时刻,充当美蒋日伪“四位一体”抵制人民军队接管天津并维护旧秩序的经济后盾

据津商会三类 9192 号卷记载,天津伪市长周迪平于 1945 年 8 月 16 日即转发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王荫泰之令,命全津官民恪守本位,勿妨治安,否则军法惩治。当天下午 4 时,邱玉堂匆忙召开紧急临时董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每天向在市郊抗击革命军队的警察供给面粉 60 袋,以 10 天为限,共 600 袋。而面粉需经日军驻津联络部同意,由商会向日本华北开发公司等处借用。

8 月 19 日,商会又奉伪市长周迪平手谕,借现金 30 万元,犒赏在市郊抗击人民军队的军警。此役中,驻津日军公然参战,死伤多名。商会以 20 万元慰劳警察,并向死伤日军赠送慰劳品和香奠共 18.5 万元。

8 月 20 日,邱玉堂又召开临时董监事联席会议,决定借给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办公费 50 万元,并按照伪天津市政府之命,为维持全津治安,由商会向各大银行筹借现金 3000~5000 万元巨款,以渡难关。

据初步统计,美蒋军队入津前,天津商会为日伪军队和警察筹措面粉共 10600 袋,现金 520 余万元。据估计,1945 年 9 月 20 日至 1947 年 7 月 25 日,天津商会为欢迎美蒋军队先后 5 批进入天津,共筹措现金和慰劳品总额达 10.2 亿元,成为美蒋军队占领天津,控制北平和华北军需的主要供应者,地地道道地充当了日降后及美蒋势力在天津立脚初期,美蒋日伪“四位一体”对抗人民革命的经济后盾。这些钱款最终都要由各业商民负担,使刚刚从日寇铁蹄下挣扎出来的广大商民,又堕入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苦海。

(二)商会凭藉市政府和社会局的威势强制会员商号缴纳会务维持费、补助费等,加重同商民对立

由于在沦陷时期商会在日本顾问的直接控制下，直接为日寇的统制和掠夺服务，商会与商民严重对立，会员商号往往以不缴纳会费为手段以示抵制。商会为维持存在，会费改由向会员直接征收。日降后不久的1945年9月11日，津商会仍如法炮制，向会员直接征收补助费，但连征三次，效果均不佳。于是社会局大施淫威，商会也通函各公会，威胁不缴纳会费各公会，将由社会局通令解散。这从一侧面反映了商会与广大商民对立的程度。

(三) 积极参加伪国大代表选举

对于战场上军事优势日益丧失的蒋介石政权一手导演的假民主把戏，天津商会决策层仍充满了幻想。从1947年初即着手准备伪“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会选举，不仅在全市各同业公会及非公会会员中广泛动员，办理换证手续，公布号数等，而且致函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冀、鲁、晋及平青各市商会，广泛宣传天津商会理事长姬奠川的政历和业绩，请各商会选举姬奠川为北方各省区立法委员，在全市范围内则支持商会常务理事赵遂初竞选“国大”代表。

(四) 为蒋介石献校祝寿筹款

1947年11月是蒋介石60岁生日，南京各界亲蒋人士为弘扬蒋介石“建国工作，教育第一”的召示，命全国各地商会在本埠献办商业职业学校一所，天津很快成立献校祝寿委员会，杜建时、李耀林、郝遇林均为委员，天津商会负责实际集款、保管等项实际事务工作，自1946年10月25日至1947年6月13日集款2.44亿元，各银行号存款利息高达6分至12分，总金额达4.55亿元。最后建立的商业学校定名为天津公立中学校。这些款项主要由各业工厂商店筹集，足见负担之重。

(五) 组建市民自卫团

1947年6月间，国民党军事上被迫转入全面防御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立即传达蒋政权各“地方速谋自救”方针。因此，天津工商两会迅速行动起来，组建天津市民自卫团。据统计，此时全

津产业工人已达 104833 人,全市职业工人更达 270075 人^①。所以工业会首先行动起来,“协力政府安定地方秩序”,“必要时得各守岗位,沉着应付”,以工厂为单位,“其厂长或全权主管人为当然负责领导者”,以“本厂防灾防护为范围,必要时受统一指挥机构临时调度对外协助”^②,并同全市 11 区属保甲相配合。据记载,市属保甲总队 15000 人,渔会之渔团共 500 户,渔船 500 只,纵横结合,表面上构成了严密的同人民解放军顽抗的“自卫网”。而在实际运作中,不少工厂、商店学校的自卫组织都被我地下党组织所掌握,防止了国民党政权覆亡前的破坏。

(六)筹摊巨款建设天津城防工程

1901 年的《辛丑条约》规定,必须拆除已建造 500 余年的天津城墙和大沽炮台,此后天津便成为有市无城的城市。且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无山丘高地,却遍地水网,历来为北京海上门户,是华北守军取得美蒋海上军援或南逃海上的唯一生命线,因而成为美蒋和华北地方势力必保之地。为此,他们效法近代史上僧格林沁和李鸿章,在天津市区外围建造土围子作防御工事,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天津城防工程。该工程根据天津城市建成区的布局特点,构筑南北长 25 华里、东西宽 10 华里、周围总长 90 华里的土围墙,墙高 4 米、宽 9 米,墙外挖一道宽 10 米深 3 米的护城河。由河底至墙顶净高 7 米。护城河可与南运河等沟通。每 30 米一碉,50 米一堡,全线共碉堡 1000 余个,由钢筋水泥筑成。重点地区还构筑数以百计的碉堡群。土墙上安有铁丝网。

城防费全部工程费用共 325 亿元。第一期工程需用 260 亿元,二期工程需款 65 亿元。蒋介石应允国库承担 50 亿元,另由敌产处理局拨付 30 亿元,经济汉奸谢吕西逆产变价得款 91 亿元,共

① 天津市政府统计处编:《天津市主要统计资料手册》第二号,1948 年 5 月

② 胡光明、蓝长濡前引书第 1728~1730 页